

我们曾经年轻

作者：董丰

(上接2022年10月21日第B4版)

上山下乡-“革命小将”们的归宿

我们第一批插队的学生1968年夏天离开北京以后，除了少数同学因为身体有病或者是独生子女而留京安排了工作，老三届中学生大多数被送去边疆、兵团或者农村。领袖在1968年底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再掀高潮。强迫动员上山下乡成了学校和街道“小脚侦缉队”的头号重任和光辉业绩。

女附中初三同学闻佳的父亲五十年代初遭受冤案被错杀。她因为说“不会做农活，怕下乡养活不了自己”而受到批判，认为她反对了最高指示。她在学校废弃的厕所里绝食自杀，在奄奄一息时被人发现后救活，并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拘捕，判刑二十年和剥夺政治权利七年，这些都没有通知她的家人。她和亲人十一年音信隔绝后被宣布无罪释放，但是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生活不能自理。由于上山下乡运动而被摧残的老三届学生不会只有闻佳一人。

我们班有四个同学被批准到锡林格勒盟阿巴嘎旗插队。林敏和我在文革中一起串联，来往密切，也被批准到牧区。她的妹妹林可要随她的学校去阿巴哈纳尔旗插队。其父想让姐妹在一起，就联系把姐姐改签到阿巴哈纳尔旗，但是这位父亲没有通过我本人就把我也给一起转了，让我十分诧异。我内心希望和女附中的大多数同学在一起，但是木已成舟，也就听天由命。

告别北京，告别苦难中的母亲

7月的北京天气闷热，蝉在后院大槐树上不厌其烦地唱着，丝毫不关心人间的冷暖。即将离家远行，在感到悲壮、苦涩的同时也让人有些激动。这不是一次平常的旅行，是在大动荡中的大迁徙，或许从此永远离开故土，离开亲人。两年来文化革命的疾风暴雨扫荡了整个神州大地。我们这些半大小子丫头们被裹挟，被蒙蔽，被利用，被伤害，最后被迁徙。学业中断，前途叵测。只有真正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理解那是怎样的一场可悲可笑的民族浩劫。

出发的时刻终于来到了。1968年7月15日，我们从北京永定门火车站踏上了北行的列车。妈妈那天竟然能从轻院“牛棚”里请假出来为我送行，给了我一个出其不意的惊喜。站台上人山人海，亲友们心情各异。列车启动时车下响起一片哭声。我没有流泪，心里想着“兵来将挡，水来土围，总会有办法活下去。”妈妈也没有流泪，在列车向前徐徐开动时，她紧咬牙关强笑着，双手抱拳举过头顶，向我挥舞，身影渐渐远去。

妈妈年轻时兄弟姊妹六人，靠父亲当大学德语教授的工资供养。外祖母出身于山东潍县农村的一个殷实大户，十四岁时以绝食抗争家庭的阻挠，到青岛一个德国教会女校读书。她聪慧异常，记忆力惊人，十九岁时完成了所有的课程，会讲流利的德语，被推荐去德国留学。当时恰逢一战，家庭又坚决反对，终未成行。她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婚后她当教师挣钱供丈夫完成学业，以后孩子多了就一心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外祖母

从小养蚕织布，针线活极佳，总能用有限的资金把孩子们打扮得体体面面。她给妈妈做的旗袍裁剪合体，针脚细密。每年冬天我们都会穿她亲手做的棉鞋。她心地善良，经常帮助周围有难之人。妈妈继承了外祖母的坚韧性格和侠义之心。

因为家境清贫，妈妈初中毕业后上了免学费，管吃住的女子师范学校，照理毕业后会做一个中小学教师。1935年的12.9运动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师范学校紧闭大门禁止学生上街游行。妈妈作为学生代表和校方谈判，据理抗争，被作为左派学生开除了学籍。

小时候有两次和妈妈出门，她示意我注意对面走来的一个女人。那人身穿灰色旗袍，阴郁的瘦长脸上毫无表情。妈妈告诉我，那是当年师范学校的国民党训政人员，妈妈就是被她开除的，偏巧住在我们东临的院子里。不知道她是否还认得妈妈，也不知道她是否有意避开了我们的目光。我有一种内心冲动想走过去告诉她，感谢她把妈妈开除了，让妈妈有机会取得更高的学位，进入更广阔的天地。

一个被学校开除的女生遭到社会上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慕贞女校是美国教会筹办的中学，校长郑乃清接收了母亲到校读高中。1938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被燕京大学化学系录取，并获得全额奖学金。母亲文学功底非常好，著文写诗一气呵成。之所以报考化学专业是因为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化学救国”是学子们的一个口号。父亲1936年汇文中学毕业后，也是抱着“化学救国”的信念报考燕大化学系，未果。在北京西山租屋备考一年，1937年被燕大经济系录取。

抗战中，母亲当空军的大哥和当军医的二哥都牺牲在抗日前线。她的父亲、大姐和三哥随学生大队和抗敌宣传队转移到四川后方。妈妈留在北京，上学之余帮外祖母料理家务，照顾年幼的弟弟。

靠奖学金读书，母亲学习特别刻苦，始终保持优异的成绩。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是基督教团契的辅导员，受到低年级学生的推崇。她参加学校辩论比赛，获得第一名“舌战群英”奖。我看到过她排演舞蹈的照片。她又是天才的悲剧演员，和孙道临等同学演出反战话剧“毋宁死”。有人告诉母亲，她是燕大学生在日本人黑名单上的第一人。燕大的围墙保护了他们这些孜孜学子。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号日寇占领了燕大校园，校长司徒雷登和美国教授都被关进了集中营。父亲当时已经毕业留校，他雇三轮车把妈妈和其他女生抢先送出校园，然后只身逃离燕大。燕园曾经是日占北京中的一座孤岛，师生们有很大的自由空间。父亲宿舍里的中国二十四史藏书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都是侵略者的禁书。日本人要求中国教师回去工作，父亲始终不应召。一是坚决不给日本人做事，二是藏书会给他带来麻烦。

失业的父亲暂住在北京同学的家里。他多方奔走，打探消息，设法营救被日本宪兵队抓捕的同学。之后他辗转到天津租界，在一个山西同乡的私人银行工作，几年里从卑微的记账员做到付总经理。公私合营后任天津市农畜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主任，直到

58年才调到民建中央做宣教工作。

失学的妈妈回到母校慕贞女中，兼教文理数课程。为了经济上帮助家庭，课余还要教三个家馆，其中一个辅导校长郑乃清的四个孩子。她口才极好，对教学认真负责，深受学生的爱戴。她自编童话剧《公主和小女孩》，和同学们一起演出。五十年以后她的学生们还和她相聚，把昔日的故事登上了报纸。

抗战胜利了，外祖父长眠在万县山林。他把对女儿的爱和祝福注入到托人带回北京的十八颗珍珠里。妈妈一直珍藏着这些珍珠，直到文革中被造反派学生抄家拿走，渺无踪迹。抗日战争结束后妈妈回到燕大完成学业。1946年毕业典礼上她作为毕业生代表致辞。

妈妈毕业正值国共内战时期，很难找工作。得助于工业先驱杜殿英先生，她进入北京造纸研究所。1949年以后她对新中国充满热爱，勤奋工作，被选为造纸所的工会主席。她是中国第一个研究毛竹造纸的人，是造纸所最大的研究室——制浆造纸研究室的主任，她和同事们承担了众多科研任务和造纸厂的工艺设计。由于成绩显著，五年里晋升了三级。

协和医院的林巧稚大夫给妈妈做剖腹产手术为我接生。因为产程过长，怕我大脑受损伤，手术中没有用麻药。我的出生让妈妈承受了常人不能忍受的巨大痛苦。仅在产后两三个月，妈妈就把我和两岁半的姐姐丢给保姆，颠簸在去佳木斯的马车上。她出差就是几个月，帮助新建的造纸厂完成投产。

由于工作任务繁重，经常要夜以继日地进行制浆工艺的化学实验，又要确保实验安全，妈妈平时住在造纸所单身宿舍，只有周末回家，家中事全托付给保姆梁大妈。每个周六傍晚我和姐姐听到妈妈自行车跨进院门的特殊响声，都会欢叫着迎出去。

父亲在天津工作时每两周回京一次度周末。1958年调到北京后一家人总算团聚了。那一年北京轻工业学院成立，妈妈被调去当教师。她以四十岁高龄到天津大学进修纤维素化学，师从龙正善教授。一年里我和姐姐只见过她一次，是爸爸带我们去天津和妈妈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星期天。我们在天大附近的郊外乘船夫的小船在芦苇丛中穿行，过得特别高兴。

进修结束后有一段时间，妈妈骑车穿梭在三个不同的地点教书和工作：北京轻工业学院、一个领导干部的调进修班和造纸所。她认为被社会需要体现了她的生命价值，虽然非常辛苦，从来不抱怨，和孩子们说起来总是以此为荣为乐。

1959年初小妹出生，正赶上三年大饥荒的开始。小妹的保姆孙姨没有城镇户口，没有粮票，和我们一样艰难度日。有一年姐姐在排球队住校训练，父亲刚刚做了甲状腺瘤手术，妈妈保证他们的定量不减。我和妈妈两人的粮食、副食供应和保姆共享。妈妈开始消瘦，之后浮肿，身体很差，但是她教课仍然一丝不苟，常常披着大衣在寒冷简陋的厨房里备课通宵，早上抓个干粮就骑车去上班。在家里她总是承担最多，享受最少。

有一年国庆节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妈妈也出席了。饥荒时期饭菜并不丰盛，饭后桌上只剩下一个苹果，大家都让妈妈带回家给三个孩子。妈妈推让不过带给了我们。总理对知识届的关怀让人感到温暖，那个苹果也格外珍贵。

——待续——